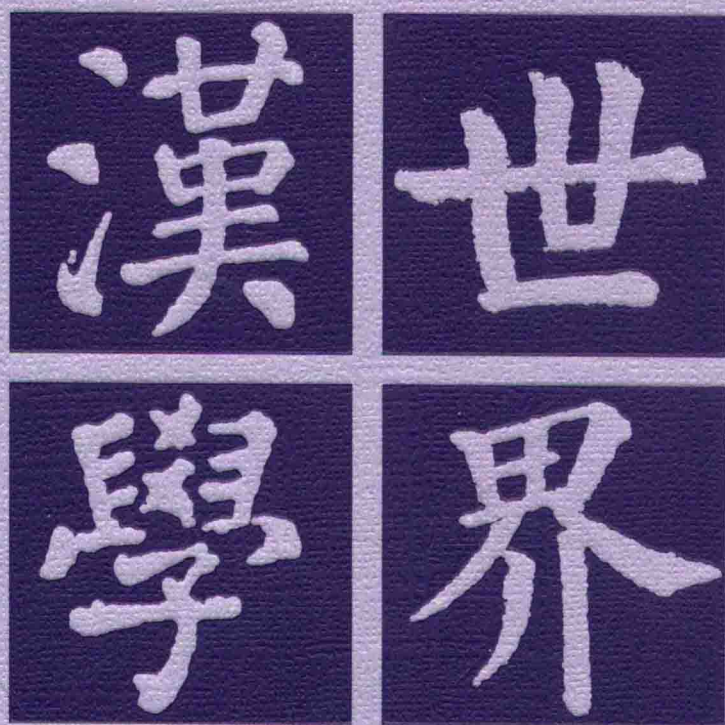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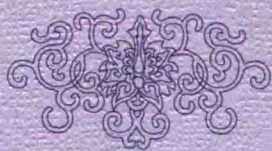


【汉学义理】又一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总
译序·近代中国的文化困境——哈佛学派的民族主义·研究【汉学史探】耶稣会
士的中国史与纪年著作及其所参考的中国文献·19世纪上半叶德语区之语言文学史
著述中的中国文学【汉学视阈】关于密教的定义、历史建构和象征意义的诠释与争
论——对晚近西方密教研究中几篇重要论文的评述·中国摩尼教遗存的刊布与研究

世界汉学·第11卷

World Sinology

Volume 11



第 11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INCIPLES OF SINOLOGY】Another “Anti-Eurocentric Theory that is Eurocentric”？—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ultur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China: Study on

the “Nationalism” of the Harvard School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INOLOGY】

Jesuit Accoun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and Their Chinese Sources ©Chinese Lite

General Historie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Germ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漢 世
學 界

第 11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汉学. 第11卷 / 耿幼壮, 杨慧林主编.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300-17675-8

I. ①世… II. ①耿… ②杨… III. ①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075号

世界汉学 第11卷

主编 耿幼壮 杨慧林

Shijie Han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210mm × 285mm 16开本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张	14.5 插页2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22 000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世界汉学》合作单位

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德国华裔学志汉学研究所
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
葡萄牙大发现纪念全国委员会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台湾“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中文系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世界汉学》编辑委员会

陈方正	Chen Fong-ching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陈平原	Chen Pingyuan	弥维礼	Wilhelm K. Müller
陈庆浩	Chen Qing-hao	任大援	Ren Dayuan
陈荣照	Chen Rong-zhao	李福清	Boris Rifitin
成中英	Chung-Ying Cheng	罗伯特·恰德	Robert Chart
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赛奇	Anthony J. Saich
杜维明	Tu Wei-ming	松本三之介	Matumoto Sannosuke
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耿昇	Geng Sheng	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耿幼壮	Geng Youzhuang	孙郁	Sun Yu
苏源熙	Haun Saussy	孙康宜	Kang-i Sun Chang
黄一农	Huang Yi-long	瓦格纳	Rudolf G. Wagn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王德威	David Wang
詹嘉玲	Catherine Jami	王秋桂	Wang Qiu-gui
纪宝成	Ji Baocheng	汪晖	Wang Hui
顾彬	Wolfgang Kubin	巫鸿	Wu Hung
李文潮	Li Wenchao	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李学勤	Li Xueqin	吴志良	Wu Zhi-liang
梁治平	Liang Zhiping	严绍溟	Yan Shaodang
林庆彰	Lin Ching-chang	阎云翔	Yan Yunxiang
刘东	Liu Dong	杨慧林	Yang Huilin
刘梦溪	Liu Mengxi	杨煦生	Yang Xusheng
刘显叔	Liu Xian-shu	余英时	Ying-shih Yu
刘小枫	Liu Xiaofeng	乐黛云	Yue Daiyun
鲁惟一	Michael Loewe	查良镛	Cha Liang-yong
罗理路	Rui Manuel Loureiro	张灏	Chang Hao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马悦然	Goran Malmqvist	张西平	Zhang Xiping
马雷凯	Roman Malek	赵令扬	Chiu Ling-yeong
孟华	Meng Hua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谷川道雄	Taikawa Michio	朱政惠	Zhu Zhenghui

主 编

耿幼壮 (Geng Youzhuang) 杨慧林 (Yang Huilin)

编 辑

时 霄 (Shi Xiao) 张 靖 (Zhang Jing)

主 办

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

(Centre for Sinology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FOR CHINA 为了中国
FOR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为了过去与未来
FOR THE ORIENT AND THE WEST 为了东方和西方

启 事

一、自 2009 年起,《世界汉学》转由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办,迄今已经出版至第 11 卷。在过去几年中,鲁惟一、巫鸿、钟鸣旦、罗伯特·恰德、成中英、戴卡琳、苏源熙几位教授相继加入本刊编委会,特向他们表达谢意。

二、沟口雄三、李福清两位编委已分别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2012 年 10 月 3 日逝世,谨此表达我们深切的悼念与缅怀。

三、本刊第 10 卷所载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教授《傅斯年眼中的哲学、诸子及中国哲学》一文原以英文发表 (“Fu Sinian’s Views on Philosophy, Ancient Chinese Master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n *Lear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 John Makeha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75-310), 由于疏漏, 文中未注原文出处, 即此增补, 并向作者、编者和原出版方诚致歉意。

目 录

【汉学义理】

- 又一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总译序 / 周 宁 1
近代中国的文化困境——哈佛学派的“民族主义”研究 / 张 萍 40

【汉学史探】

- 耶稣会士的中国史与纪年著作及其所参考的中国文献 / [比利时] 钟鸣旦 55
19 世纪上半叶德语区之语言文学史著述中的中国文学 / [奥地利] 雷乔治 103

【汉学视阈】

- 关于密教的定义、历史建构和象征意义的诠释与争论——对晚近西方密教研究中
几篇重要论文的评述 / 沈卫荣 115
中国摩尼教遗存的刊布与研究 / [美国] 马小鹤 136

【汉学新论】

- 中国先秦时期的丧葬礼俗——《礼记》和《仪礼》的部分记述 / [意大利] 李集雅 161
美：古老的中国经验 / [塞尔维亚] 拉多萨夫·普西奇 173
对中国的礼文化及其典籍翻译的思考 / [罗马尼亚] 白罗米 177

【经典诠释】

再访孔子：古文本，新言说（续）——法兰西学院授课讲义（2010—2011）/[法国]程艾蓝 183

【文学对话】

略说朝鲜时代女性诗文的特点 / 张伯伟 195

中国文学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 [以色列]夏维明 209

又一种“反欧洲中心的 欧洲中心论”？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总译序



周 宁

周宁 / 厦门大学

196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一、二分册，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现代史^[1]专业伯纳多德·施密特讲席教授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 又译劳端纳, 1917年9月24日—2000年10月26日)。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作为书名，大概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二是指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亚洲文化的作用或影响。书名似可译为“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影响”，这样意义更加明确，但却不够准确。因为书中讨论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的影响，内容并不充分，就目前已出版的三卷九册而言，作者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的仅是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出版，似乎并未引起大反响。一则当时西方世界现代史或欧洲现代史学界，依旧是“欧洲中心论”一统江山，关注的问题是西方如何自发地兴起、如何向全球扩张、如何创造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从反面思考亚洲或非西方世界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有意“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思潮，

尚未出现；二则，仅从第一卷来看，不论在观点的新锐、史料的丰富，还是规模的宏大程度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都还不足以成为一部“巨著”。然而，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这两册将近1000页著作的出版，将引出未来28年间一套三卷九册的巨著陆续面世。《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分三册，出版于1970、1977年。到1993年，第三卷分四册出版的时候，《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已经成就三卷九册、近5000页的皇皇巨著。它们是：第一卷《发现的世纪》，一、二册；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第三卷《发展的世纪》：第一册《贸易、传教、文献》、第二册《南亚》、第三册《东南亚》、第四册《东亚》。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发愿、研究、写作到出版，历时半个世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拉赫已经是近80岁的老人了。60年前读大学时的一个学术念头，研究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的影响，竟耗去了他将近一生的年华与精力。^[2]能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是无比幸福圆满的。当年吉本(Edward Gibbon)

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成14卷，耗时20余载，著作最后完成时，吉本说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犯，终于获释了。然而，生命可有“可承受之重”，却不可有“不可承受之轻”，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完成6年以后，吉本就去世了。生命是需要事业支撑的，1993年，拉赫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三卷九册，7年以后辞世。有这样一套巨著纪念，拉赫的一生当是幸福圆满的。茨威格说过，人生应该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寻求不朽。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三卷九册完成，不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学术界，都是一项“壮举”。在拉赫最初的设想中，该书将系统整理现代历史早期——15到18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并试图讨论亚洲知识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影响。^[3]《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书名暗示了全书的主题：现代欧洲形成中亚洲的作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作用。

拉赫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过程，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对亚洲的影响，而是“发现”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本身的影响；他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文化方式，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对欧洲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而是观念与知识方面的影响。拉赫思考的是观念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他为自己的研究明确设定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带来的实际影响。拉赫的著作最初的用意并不仅在“欧洲的亚洲知识”上，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亚洲文明曾经启发欧洲的现代化历史，并从思想、制度、艺术与技术上塑造了现代欧洲。在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似乎具有某种“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倾向。^[4]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不仅欧洲促进引导了亚洲的现代化，亚

洲也曾促发推动欧洲的现代化。

当然，不管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亚洲中心论”，从跨文化研究立场上看，都是一种“偏见”。世界现代文明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现代化历史或全球化的历史，是一个多元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系统进程。欧洲与亚洲是一个互动互惠的整体，发端于古老欧亚大陆的近500年现代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代。面对这个大时代，不论探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还是亚洲对欧洲的影响，都是重要的课题，具有非凡的意义。只有大著作才配得上大时代，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评论这部书时说，“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属于这类巨著。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5]

一、“发现的世纪”： 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关注欧洲的亚洲知识与亚洲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两个层面的内容，从整体上看，其研究框架是这样的：拉赫首先在系统的时空框架上全面考察了欧洲现代化早期亚洲知识的成长。在时间上，这种知识上的增长从中世纪晚期或蒙元世纪的大旅行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前，也就是从地理大发现到文化大发现；在空间上，这种知识的拓展从南亚开始，逐步向东南亚、东亚推进，首先是印

度，然后是马来半岛、中南半岛，最后是日本与中国。中国不仅是地理上最遥远最神秘的地方，也是知识上最遥远最深刻的地方。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拉赫试图将研究深入到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上，具体考察亚洲文化对欧洲现代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思路纵横交错，在第一卷中，他实际考察了16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与方式，其中回顾的古代与中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与想象，更像是“剧前故事”。从第二卷开始，拉赫分别从视觉艺术与工艺、文学与社会知识、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等方面，探讨欧洲的亚洲知识的积累与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第三卷沿着西方贸易与传教势力的推进，分别描述欧洲对亚洲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东亚的知识状况，并试图研究亚洲不同区域文化对欧洲现代化的影响。当然，这是个更为庞大复杂的问题，拉赫还计划写第四卷，具体分析亚洲不同区域国家“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卷是他最初研究规划中没有的，因为写作内容规模不断扩大，才衍生出第四卷的计划；令人遗憾的是，他在第三卷第一册前言中许诺的第四卷，最终也未能完成。而这一“未完成的第四卷”留下的遗憾，将可能影响到《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整体理论的建设。

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的重点是16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认知与想象。尽管1500年前后是拉赫在时间上的研究起点，但此前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或想象并非一片空白。第一卷开始，拉赫简要回顾了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东方传说一直到中世纪，尤其是蒙元世纪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曼德维尔等人的“亚洲故事”，已经使欧洲认识到一个若有若无、似真似幻、令人将信将疑的“神奇的亚洲”。但是，16世纪之前欧洲的亚

洲知识，既不确实，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有限，所以拉赫在自己的研究中将这一部分内容当作某种“前奏”或“剧前故事”处理，先追溯欧洲前现代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的东方“知识”遗产。

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东方知识基本上只限于印度，托勒密时代或许听说过东南亚与东亚的中国，但知识不具体而且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混杂在一起。中世纪欧洲的东方知识水平，衰退与进步同时发生。一方面是古典时代的东方知识被遗忘了，另一方面，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与交流，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为欧洲带来了新的东方知识。最后是蒙元世纪的大旅行将许多欧洲人引向东方，直到最遥远的中国，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来到中国边境，而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则深入大汗统治下的中国并生活多年。最重要的是，这些旅行者不仅深入亚洲了解亚洲，而且又将亚洲的消息带回欧洲，笔者在《天朝遥远》中曾如此论述这一时代欧洲的亚洲知识的意义：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在汗八里或行在，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的、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

地方。“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6][7]}

实际上，没有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就没有西方历史上那个“走向世界”的时代；没有大旅行时代刺激起的西方对东方文明的渴望，也就没有伊斯兰世界复兴后西方人探索新航路的冲动；没有中世纪晚期亚洲知识与想象对欧洲文化的启发，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甚至文艺复兴出现。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给契丹大汗盖着金印的国书、托斯卡内里的信与海图，可能还有《马可·波罗游记》，从帕洛斯港启航寻找通往大汗国土的新航路。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新航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6年以后，达伽马的船队带着对印度胡椒与香料的记忆和渴望，还有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与猜想，到达南印度，上岸后通报印度副王，他是来找香料与基督徒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亚洲知识或想象，对欧洲现代历史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拉赫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启发，只是对这种启发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艺术与技术、观念与信仰“并没有因为亚洲知识的传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在大量的欧洲人开始去亚洲生活和工作，并开始将他们熟悉的欧洲文明的观念和实践，与他们在亚洲的见闻体会比较之后，欧洲文明的自我变革才有可能发生。”^[8]

蒙元世纪将欧洲人带到亚洲深处，此时欧

洲关于亚洲的知识，已经在欧洲酝酿一场革命。不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文艺复兴，其文化动力与灵感都可以追溯到蒙元世纪东方知识的开放。拉赫博士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论述翔实而深刻。他所使用的史料不仅有严肃的知识性著作，还包括宗教传说、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尽管这些知识或传奇多有荒诞不经之处，但作为欧洲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与灵感，其意义是重大的，而且，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中世纪传奇的迷雾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具体切实的知识。从果阿到马六甲、从澳门到长崎，关于东方世界的知识随着旅行游记、传教报告、商贸手册传回欧洲，亚洲知识在具体化的同时也科学化了，不仅传教士、航海家、商人、政府关注亚洲知识，文人与科学家也开始相关的著述与研究，16世纪欧洲知识系统中的亚洲，已经具有了严格的历史与地理、制度与风俗研究的意义。

拉赫简要回顾了欧洲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亚洲知识状况之后，进入该书的主要内容：详细论述了地理大发现早期或者说16世纪欧洲的亚洲观念与知识状况。历史很难有一个截然分明的起点。拉赫取1500年为起点，也是一个惯常的、约定俗成的做法。史学界通常将1500年当作全球化历史的起点，根据是15世纪最后10年东西航路的发现。《发现的世纪》以1500年和1600年为上下时限，1500年大概是西方扩张的开始，而1600年是西方扩张第一波结束第二波开始，西北欧取代了伊比利亚，成为欧洲扩张的主力。历史也很难划定一个确定的区域，拉赫的著作名义上研究“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实际上拉赫使用的“欧洲”大概等于“西欧”，而“亚洲”大概等同于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古代到中世纪欧洲曾将这一地区统称为“印度”。拉赫在第一卷导言中提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深入论述：“这里使用的‘亚洲’，指的是印度河

以东地区的大陆和文明。‘欧洲’则指斯拉夫语世界西部的国家和人民。”^[9]

新航路的发现使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直接交通与贸易成为可能，欧洲开始接受一个真实的亚洲。只有在一个普遍接受的真实的亚洲前提下，亚洲知识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实际影响才成为可能。地理大发现造成欧洲与亚洲在商贸与传教上的直接联系，亚洲货物，诸如印度的胡椒豆蔻、中国的丝绸瓷器，开始出现在欧洲，从沿海港口到内陆城镇；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们，尤其是耶稣会士，也开始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前往果阿、捕鱼儿海、马六甲，一直到澳门，他们传回的关于亚洲风物人文状况的书信或报告，借助新兴的印刷技术在欧洲传播。欧洲文化中的亚洲逐渐成为一个真实的、有文明人居住的世界，并开始影响欧洲人的生活与观念。至此已经出现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16世纪的欧洲对亚洲逐渐形成某种“整体性认识”。在欧洲人的世界知识中，印度河以东的亚洲是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甚至文明的地方，主要由三大国家与区域组成，那就是印度、中国与由许多岛屿构成的东南亚。欧洲的亚洲地图已经绘出现代亚洲地理的基本轮廓，并注意到亚洲的山川构造对亚洲政治与人文的影响。他们对亚洲不同地区国家在物产、风土、人情、制度、信仰上不同的特点，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印度盛产香料，是一个信仰多元的神秘的国度；中国更为理性也更为世俗，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物产丰富，但与欧洲的贸易前景尚不明确；东南亚是个人种博物馆，香料群岛丰富的贸易资源，几乎让欧洲人只见财富不见人文。

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知识量的明显增加之外，关注点的转移也

值得注意。16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亚洲知识已经基本上涉及印度河以东亚洲的不同地区，但主要还在印度与东南亚，他们了解最多的是马拉巴尔、果阿、马六甲和香料群岛这些地方。香料贸易将印度和东南亚带入欧洲人的现实世界，此时，中国还基本上是传说，日本就更为模糊神秘。但到16世纪后半叶，中国与日本逐渐取代印度和香料群岛，更为欧洲人所关注。欧洲人对南亚和香料群岛热情减弱，一则因为香料贸易已经基本稳定，二则因为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教屡受挫折。与此同时，传教士刚刚进入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巨大的、统一的帝国。中华帝国对欧洲人的吸引力，不仅展现在财富与风俗上，还有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各方面内容，从器物、制度到思想。16世纪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风靡欧洲，几乎把中国描绘为一个理想帝国。如果说香料贸易使印度与东南亚成为与欧洲密切相关的“生活现实”，中国则寄托着欧洲人关于社会制度的理想。

与几乎同时发现的荒蛮的美洲不同，亚洲在自然资源、社会人口、技术与工艺上都优于欧洲。亚洲物产丰富，除了诱人的香料之外，还有印度和缅甸的宝石，东南亚的贵金属，印度、中南半岛、中国与日本的稻米，中国的大黄和高丽的人参，以及各种珍稀动物如大象、犀牛、老虎、蛇、鳄鱼、飞鱼、天堂鸟等。亚洲人口众多、人种复杂、城市巨大、经济发达。亚洲有黄种人、黑种人，他们的皮肤从黄色到黄褐色到棕褐色到浅黑色、黑色，甚至还有白色，在欧洲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是白肤色的。欧洲人习惯以肤色判定文明，白色近于欧洲人，是最优秀的人种，而黑色近于非洲人，是最劣等的民族。欧洲的肤色种族主义古已有之，并不是进化论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还有，现代欧洲的政治理念也并不是从开始就

倾向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早期他们更倾向于开明君主制度，他们羡慕像中国、暹罗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集权国家的社会秩序与管理效率更有益于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他们憎恨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教信仰，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和开放的宗教态度充满好奇。

拉赫对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的研究具体而深入，从航路的开辟到传教点的建立，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日本、中国，拉赫追索西方商贸、传教与求知的足迹深入更深更远的亚洲腹地。首先，他分别叙述欧洲国家在东方扩张中的作用与相互之间的竞争，详细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相关文献，从商务与传教报告到虚构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如何形成、如何传入欧洲并在欧洲不同国家传播。通过讨论欧洲不同国家语言的文献，拉赫不仅介绍了亚洲主要国家诸如印度、中国、日本的情况，也没有忽略诸如马来亚、菲律宾、中南半岛一些次要国家或地区，并利用了当代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详尽的文字论述之外，作者还提供了多幅地图和地图说明，以及书后长达75页的分类文献索引。拉赫的著作不仅对欧洲史研究有贡献，他所提供的欧洲文献，对亚洲历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首先改变了欧洲。就改变世界而言，它是全球化历史的起点，就改变欧洲而言，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地理大发现在西方历史上引起的革命，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它改变了西方文明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

现作为一种文明的进程。早在16世纪末，法国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ere）在《三个世界》（*Les Trois Mondes*, 1582）中对世界进行了历史性描述，他不仅承认亚洲是文明的源头，也承认亚洲在制度与文物上的先进；在宗教信仰上他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作为新教徒，他敬慕耶稣会在东方的努力，虽然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但也能看到其他文化的优越性。更激进的如法国人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发表于1553年的著作《世界之奇迹》（*Des Merveilles du Monde*），他试图证明东方优于西方，基督教并不是掌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东方智慧要远优于西方。波斯特尔是伏尔泰等人的先驱，早于启蒙运动200年。

16世纪的欧洲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是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形成，是一个过去尚未过去、未来仍未到来的时代。就亚洲知识而言，旧传说与新知识纠缠在一起，1550年前后，欧洲一部分人与一些国家，已大致掌握了这个广阔的大陆与众多岛屿的地理轮廓与国民状况，但托勒密地图依旧主导着欧洲人的亚洲地理观念，中世纪遗留的长老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也依旧在民间流传。欧洲人在贸易上是开放进取的，在文化上，尤其是信仰上，却是保守封闭的。他们仇恨伊斯兰教文化，鄙视印度教习俗，同时也排斥佛教。印度教是印度本土的信仰，在印度信众广布，其中瑜伽信徒多为一些圣洁、温顺、智慧的人，婆罗门却傲慢难以接近。在基督徒看来，印度教的某些偶像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他们也一直在印度寻找圣托马斯传教的遗迹。佛教起源于印度，流传四方，兴盛于中国。但中国信众似乎并不虔诚，中国是一个有多元信仰的国家，这让基督教传教者看到机会。欧洲扩张者中，商

人对亚洲的宗教好奇但没有兴趣，传教士有兴趣，但出于宗教偏见，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异教。他们并不了解佛教在亚洲的传播方式，也不知道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更能理解日本的神道教教义和仪式。欧洲人大多反感印度与东南亚岛屿社会的生活方式，但颇为欣赏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家庭制度。他们尽管还不可能了解儒家伦理社会的真正意义，但儒家伦理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展现出许多让欧洲羡慕的特征，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中国社会的教育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欧洲。16世纪的欧洲人尽管不可能完全理性开放地理解亚洲文化，但好奇心与求知欲促使他们收集了大量有关亚洲早期历史和民俗、语言和文学、艺术和技术乃至科学的资料。

作为一位志向远大的历史学家，拉赫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西方历史学界的一个巨大偏见或盲点：人们只注意欧洲对亚洲的影响，这方面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关于相反方向的问题，如亚洲对欧洲的影响，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很少有这方面的著作讨论亚洲对欧洲尤其是现代欧洲的影响。拉赫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西方历史学的现状。《发现的世纪》的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欧洲的亚洲知识的获得与积累，尚未深入拓展到亚洲知识对欧洲社会的影响的深度层面上。但不管怎样，欧洲扩张过程中亚洲知识的最初样貌，已经在第一卷《发现的世纪》中呈现出来。

有人提出一种观点，改变了研究的方向与方法；有人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历史叙事，使研究观念与方法有了可靠的根据。拉赫收集了欧洲16世纪浩瀚的亚洲知识史料，同时掌握了多种语言以便阅读这些史料。他的努力是巨大的，收获也必将巨大。拉赫不仅全面展现了16世纪

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为进一步研究亚洲知识对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的深层影响，从观念与制度到艺术与技术等不同方面，准备了扎实的史料基础。这也可能是《发现的世纪》深入讨论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最有学术价值的方面。拉赫本人也表达过，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为不同学科的专家更为精细的专论提供一个笼统的背景”。

《发现的世纪》梳理了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的来源与传播渠道，相关文献涉及大量的公文、游记、传教报告、书信、编年史、回忆录、航海日志与地图册。但是，对于相关亚洲知识在欧洲的影响，第一卷尚未展开论述，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作者留待第二卷讨论。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的增长与社会影响是显著的，这种影响远不限于航海、商贸、殖民与传教等历史实践领域，还深入到欧洲现代的知识与价值革命领域。遗憾的是，拉赫关注知识史的问题，却没有将一般知识进步的历史描述推进到思想史的分析层面，所以，这多少会令在浩瀚史料中寻找深度思想与观点的读者有些失望。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辟了一个深广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多层次多方向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拉赫继承了兰克开启的史学传统，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考辨；重视史料来源，深入档案文献，根据原始的文献用文字复原历史，超然是非褒贬之外地“如实记述”，不作价值判断，不加主观见解，不讨论历史的一般规律；同时又避免过多地关注政治史，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与文化问题上。拉赫又借鉴同时代风行的年鉴学派开辟的“新史学”，努力突破传统的政治史格局，侧重社会经济文化分析，将研究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层面上；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

学等，进行文化史或观念史的研究；关注亚洲知识和观念的形成、传播、影响，具体到知识与观念的形态、文化样式与物质构成、社会流行与传播方式、教会宫廷与商业运作、读者的接受视野、理解与应用方式等。最后，他也努力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观念史或文化史的深度与广度，揭示欧洲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关于亚洲的观念的流行与心态变化的过程与方式。但是，他在观念与艺术本身的研究上，并未达到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深度与高度，也没有对导致思想或观念本身的意义及其变革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语境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拉赫治史的文献功力是非凡的，掌握并分析如此浩繁的史料，对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拉赫的一些疏漏，诸如拉赫可能不太熟悉航海技术与海图，对航海里程单位“里格”（league）的换算有问题，甚至不清楚中世纪晚期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究竟是一张图还是由多幅地图构成的地图册，如此巨大的文献索引再注“前揭书”（op. cit.）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引起混乱。另外，书中还出现若干处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与不统一，如著名制图师 de Lemos 的名字被误拼为 de Limos，诸如此类。有些问题我们有能力发现的，已在翻译中加了注释，拼写错误我们已在译名对照表中作了核对统一。

二、“奇迹的世纪”：

16 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拉赫写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那些年，正值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58年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毕都（George W. Beadle）、曾任美国联邦司法部长的李维（Edward H. Levi），相继出任校长（1961—1968、1968—1974），著名历史学家、《西方的兴起》

的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任历史系主任，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等著名学者云集芝加哥大学，《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两册出版那年（1965）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杨联陞也相继受聘芝大历史系。拉赫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从事自己的研究，条件优越、学养深厚、视野宽广、工作艰辛。

第二卷《奇迹的世纪》将研究拓展到16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层面上明显推进了一步。拉赫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研究明确设定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带来的实际影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只讨论到第一个层面的内容，至于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实际影响，拉赫许诺将在第二卷论述。第二卷如期将研究推进到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上。第二卷《奇迹的世纪》分三册，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分别讨论16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艺术与文学、科技与学术的影响。

16世纪是“奇迹的世纪”，“新发现”的亚洲开始影响到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民间工艺到高雅艺术，从文学到历史，从科技到学术。在第二卷第一册《视觉艺术》中，拉赫首先追踪16世纪亚洲艺术品或工艺品的流传过程与收藏方式，并进一步考察这些艺术品或工艺品对欧洲的实际影响。见到这些稀奇的亚洲“珍宝”，诸如各种工艺品，树木花卉，珍禽异兽，颜料与香料，纺织品与家用品，欧洲人的具体反应是什么？好奇、热情？轻蔑、冷漠？模仿、创造？他们如何把这些物象展现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拉赫在研究中发现，尽管稀有的东方艺术品或手工艺品还不至于挑战或改变欧洲艺